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镕 主编

戴家湾卷

任雪莉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戴家湾卷

任雪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戴家湾卷 / 张懋镛主编; 任雪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03-046613-6

I. ①中… II. ①张…②任…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宝鸡市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5406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曹 伟 / 责任校对: 彭 涛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1/2

字数: 367 000

定价: 1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几万还是十几万，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鬲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角度

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地反复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她）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她）们放大胆子去写，因此他（她）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她）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她）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与曹伟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镕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戴家湾铜器的历史地位（代序）

16年前，在写作《西周方座簋研究》一文^[1]时，我注意到宝鸡戴家湾铜器的特别之处。2006年，在为任雪莉同志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考虑到她来自宝鸡，于是建议她整理研究戴家湾铜器资料。其硕士学位论文《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的整理与研究》（以下简称《任著》）完成于2008年5月，经过3年的修改、增补，终于形成书稿要出版了。任雪莉同志希望我写一篇序言。在这里，我想借本书的一角，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权作抛砖之举，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一个难做又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如果要谈民国时期发现的青铜器，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似乎应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近年来出版的论著中，戴家湾商周铜器群没能占到它应有的地位。例如，2009年出版的朱凤瀚先生的新书《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在谈到1949年前发现的重要青铜器群时，列举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晚期青铜器群，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战国青铜器群，1928年河南洛阳金村战国青铜器群，1929年河南洛阳马坡西周早期青铜器群以及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战国晚期青铜器群，却未见戴家湾商周铜器群^[2]。在李海荣先生的《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一文中，关于戴家湾商周铜器群也只有一句话，提到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的《桫椤的考古学研究》，对宝鸡斗鸡台（按：即戴家湾）出土的包括铜禁在内的一批铜器进行的研究^[3]。其实并非研究者忽视了戴家湾商周铜器群，而是由于戴家湾商周铜器群太特殊了。

毫无疑问，整理与研究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是一个非常难做的研究课题。因为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由于被盗掘而流散于世，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是一堆缺乏时空概念的器物。究竟哪些是宝鸡戴家湾出土的铜器，其年代从何时开始，至何时终结，迄今没有人能搞清楚，至于墓葬形制如何，哪些铜器是哪个墓葬出的，则是一个永远的谜。相对于上述五次民国重要青铜器的发现，当时及其以后不久就有相应的著录介绍，如《新郑古器图录》《浑源彝器图》《浚县彝器》《楚器图释》等，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有吗？没有。最早将戴家湾铜器汇集成册的是陕西的刘安国先生，他在1954年编撰完成了《雍宝铜器小群图说长编》，可惜没有出版，甚

至很少有人知道这本油印的小书。况且,不少青铜器已经流失,仅存照片,大部分照片模糊不清。缺乏著录,缺乏清晰的资料,缺乏专家学者的研究介绍,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怎能广为人知呢?

整理与研究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虽然是一个难做的研究课题,但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商末周初的关中西部,除了后来的强国墓地,恐怕没有其他地点像宝鸡戴家湾这样出土如此重要的一批青铜器。我以为《任著》一书的意义,就在于系统整理收集资料,分析戴家湾商周铜器群的来龙去脉,肯定它的价值,确定它的历史地位,引起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下面,我想在《任著》的基础上再一次强调研究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的重要性。

二、一群惊艳世界的青铜器

如何衡量戴家湾铜器群的重要性,只要看看这群铜器的收藏情况就不难明白:大部分戴家湾铜器的精品不在国内,在国外。据《任著》统计,国外展藏情况如下^[4]。

(1) 美国:铜禁、鼎尊、鼎卣1、鼎卣2、卣、妣己觚、亚盨爵、祖癸角、多父乙角、天父乙觶、雷纹觶、子父乙盃、铜匕、铜斗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匚方鼎、直棱纹鼎、中子戛觥藏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文父丁觥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直棱纹方彝藏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匚父丁扁足鼎、直棱纹鼎、凤鸟纹方座簋藏赛克勒美术馆。鲁侯烝鬲、凤鸟纹卣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乳钉纹四耳簋、凤鸟纹卣藏弗利尔美术馆。卣藏圣路易市美术博物馆。卣系布伦戴奇收藏。

(2) 欧洲:告田觥藏哥本哈根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异形兵器藏巴黎基美博物馆。

(3) 日本:伯鬲藏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用征卣藏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4) 澳大利亚:高卣藏墨尔本国立维多利亚博物馆。

共有47件戴家湾铜器有明确的收藏单位,其中33件为国外的公私藏家收藏,占70.2%。一个面积不大的戴家湾墓地,竟然有这么多青铜器在国外著名的大博物馆中亮相,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器物极具震撼力。我们不妨来具体看看这些精品的面貌。

1. 举世无双的铜器——青铜禁

戴家湾墓地前后出土大型青铜禁4件,现存2件,还有小型青铜禁。《任著》已指出:“铜禁是戴家湾铜器群中最具特色的一类器物。”它与方座簋有关系,但是还不一样,方座簋不仅在宝鸡地区有,而后又扩展到宝鸡以外的其他地方,但铜禁不仅在宝鸡以外的地方没有,就连宝鸡地区,除了戴家湾,再也不见第二个地点有发现。这类器物在商代没有出现,在西周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现,直到春秋晚期才在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中出现,但形制有所不同^[5]。所以戴家湾出土的青铜禁颇有点举世无双

的意味。可以说它是戴家湾青铜文化的标志。

现存的2件铜禁，一件长87.6厘米，一件长126厘米，体量都很大。更绝的是在它上面还要放置30~40厘米高的尊、卣等重器。这是何等宏大的规模，我们还曾在哪里见过？试想主持此等祭祀场面的主人又是何等地位的贵族！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在下寺墓地24座楚墓中最引人注目，据考证，墓主人是楚国的令尹^[6]。由此可以推想戴家湾墓地主人的身份地位了。单凭这两件铜禁，就足以让人对戴家湾铜器群刮目相看了。

2. 最大的单体方彝——四出戟方彝

戴家湾墓地出土2件四出戟方彝，大的通高49.1、口横25.5、口纵21.6厘米。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五号墓出土的妇好偶方彝通高60厘米^[7]，是方彝中最大者，但那是偶方彝，而且偶方彝只有那么一件。就单体方彝而言，戴家湾这件四出戟方彝无疑是迄今所见体量最大者^[8]。最大的单体方彝出土在陕西宝鸡戴家湾，具有重要意义。或许论者以为它是从河南运到宝鸡戴家湾来的，以为它是戴家湾工匠仿殷墟铜器而作，其实不然。

这件方彝的主体部分虽然与殷墟出土的方彝很接近，但是很有自身特点，最大的不同在于器上的装饰。在盖面上有两对高耸的树枝状装饰，可却立。在器身两侧平行伸出两对棱脊，相当于器耳。这种树枝状伸向空间的棱脊，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器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打破了以往几乎方正的器物形态设计理念，通过伸向空间的棱脊，在极度地向外扩展，让欣赏者明显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

与本器最为接近的是另一件四出戟方彝，只是后者较小，通高28.9厘米。另外，戴家湾还出土2件凤鸟纹卣，器的上腹部斜伸出四条粗壮的棱脊，这种装饰风格与四出戟方彝颇为相似。戴家湾青铜器如直棱纹鼎、鼎尊、鼎卣、凤鸟纹卣、鬲彝上的扉棱一般比其他地方的青铜器上的要宽大粗壮。还有戴家湾出土的四耳簋（下详），其簋耳极大，其乳钉极长，显得很夸张。可见这种装饰风格不是只存在某一种器上，可以说它是戴家湾青铜器的一种装饰理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戴家湾青铜器中至少有一部分器物的总体风格与殷墟青铜器是不同的。殷墟青铜器其形制、纹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也有比较奇特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比较规整，可想当时铸造青铜器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超越法度。而部分戴家湾青铜器则不同，或许这里的设计与铸造者受制度的束缚少一点，可以恣意，可以张扬，或许宝鸡地区有这样的氛围，他们欣赏比较自由奔放的情调。联想到四川彭县竹瓦街铜罍上夸张的扉棱，新干铜鼎耳上外加的老虎装饰，都可以看到周边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差异，前者神秘又诡异，后者则严谨而明晰。

3. 精致的方座簋

如果说青铜鼎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那么青铜簋则是西周青铜器的代表。这

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型式多样,纹饰别致,铸造精美。这一点在戴家湾的青铜簋有上佳表现。戴家湾的青铜簋型式多样,有方座簋、四耳簋、双耳簋、无耳簋。

方座簋(2件)是戴家湾铜器群中颇具特色的一类器物。一件是甲簋,一件是凤鸟纹方座簋,都属于我们所分的A型簋。年代比较早,在成康时期。前者腹部布满尖刺状乳钉纹,这种乳钉很特别,又长又尖,是陕西地方特有的纹饰;后者腹部及圈足饰凤鸟纹,这种凤鸟的羽毛绽开,很少见。我和《任著》都做过统计,总共有10件,有出土地点的7件都在陕西地区,除了戴家湾出土的4件之外,还有岐山1件,陇县1件,韩城1件,所以我们认为:“宝鸡戴家湾一带很可能是这种凤鸟纹铜器的原产地。”^[9]关于方座簋,我们写过两篇文章《西周方座簋研究》《再论西周方座簋》,提出了一个观点:“方座簋起源于宝鸡说。”^[10]特殊的尖刺状乳钉纹、特殊的凤鸟纹装饰在特殊的方座簋上,诸多地方元素纠合在一起,你想不说“方座簋起源于宝鸡”都很难。

近年来,安阳殷墟孝民屯发现铸铜遗址,出土一批陶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几块陶范的形状、纹饰与西周时期流行的方座簋的底座相近。如果事实成立,似乎意味着方座簋在商代晚期的殷墟就出现了。如今,面对孝民屯铸铜遗址的发现,我们是否需要修正往日的观点呢?最近我们又发表了《三论西周方座簋》一文^[11],现将要点介绍如下。

第一,要确定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就是方座簋底座的外范,证明起来恐怕还有困难。

第二,迄今殷墟大、中、小型各等墓葬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铜器成千上万件,还有据传是殷墟出土的铜器,却没有一件是方座簋。

第三,殷墟缺乏产生方座簋的充足条件。在殷墟,有很多体量很大的铜器,但簋类器始终缺乏大器。可能这一点影响了方座簋的产生。

第四,宝鸡地区具备方座簋产生的充足条件。宝鸡地区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墓葬中,仅随葬食器而无酒器的就有12座,占铜器墓总量的一半以上,数量远远超过殷墟地区(7座),陶器组合则以饪食器(罐鬲)为主。近来,我们又论证了“列鼎”制度起源于宝鸡地区,时间在商代晚期。而此时正是方座簋产生的时候。这自然不是一种巧合。

第五,在殷墟,没有发现与青铜方座簋相似的其他质地的器物。方座簋的产生与商代晚期流行的方形器有关,但方形器流行于殷墟二、三期,到了四期,方形器已经不多了,要说二者有关系是没错,但这关系显然并不深。再说,殷墟四期的青铜器已经缺少昔日的辉煌,没有能力铸造出青铜方座簋这样的新器物了。

第六,我们似乎习惯了某一种思维定式:如果在同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出现相似的器物,我们总是喜欢说是中原地区影响了周边地区。为什么不能逆向思

维,是周边地区影响了中原地区呢?

第七,不能过于强调铸铜作坊出土陶范的作用。因为安阳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既可以铸造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也可以铸造非本地特色的青铜器,所以退一步来说,即便这里出土了方座簋的陶范,也不能肯定这里就是方座簋的起源地。

在殷墟青铜器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哪些器类、器物属于以商王室为首的商人所发明、设计、铸造?哪些器类、器物属于其他国族所发明、设计、铸造?有什么理由说凡是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都是殷墟自产的?

在宝鸡地区,出土方座簋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戴家湾墓地与强国墓地,方座簋极有可能诞生在这两个地方。考虑到禁与方座簋的密切关系,方座簋很可能首先是从戴家湾产生,而后在宝鸡地区流布,然后再推向东方。如果这个推论成立,戴家湾铜器在宝鸡地区铜器中的地位就显得更重要了。

4. 奇特的乳钉纹四耳簋

商代未见四耳簋。四耳簋始自西周早期,但西周早期四耳簋的数量也不多。戴家湾出土的这件四耳簋很特别。一是器物厚重,尺寸较大(高23、宽36.5厘米)。二是四耳较宽大,耳上端的牛角高耸,超过口沿许多,下接长方形垂珥。与其说设置四耳便于提携,倒不如说张扬的簋耳更富有一种艺术的魅力。三是口沿下及下腹部饰尖刺乳钉纹三排,间以短扉棱。乳钉又粗又长,顶端尖利,这种尖利的乳钉极为少见。与该器形制纹饰相似的还有宝鸡强国墓地纸坊头M1出土的四耳簋,但是后者身上的乳钉凸起较为圆滑,与前者迥异。戴家湾的这件乳钉纹四耳簋,造型及纹饰极具特色,目前仅见于戴家湾。

5. 尖刺乳钉纹盆式簋

应特别关注戴家湾墓地出土的11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这种簋外表并不精致华丽,但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簋,主要出在陕西。陕西出土了40余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而戴家湾墓地就出土11件,《任著》指出: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前所未有”。无论戴家湾是否为这种尖刺乳钉纹盆式簋的发源地,它总是这种簋的重要产地。

6. 出类拔萃的青铜豆

戴家湾铜器群中有4件豆,这是很不寻常的现象。青铜豆自殷墟二期才出现,商代晚期青铜豆都很少,像江西新干大墓那样的高级别墓葬也只出土1件。在整个西周时期,出土4件青铜豆的墓地,除了茹家庄一号墓,就是戴家湾。戴家湾的青铜豆不仅时间早,而且器形特别高大,通高28.6、口径19.3厘米,是西周青铜豆中最大者。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青铜豆的体量都不大。如西周早期的史父乙豆通高12.1、口径13.1、腹深4.9厘米,康生豆通高15.1、口径15.5、腹深6.2厘米,其通高只有戴家湾铜豆的一

半左右。像戴家湾铜豆这样体量的豆到春秋中期才出现。如1983年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国墓地出土黄夫人豆通高29、口径24.2、腹深10.8厘米,1980年河北三河大唐迥1号墓盖豆通高28、口径18、腹深10.1厘米,1975年河北三河双村1号墓盖豆通高33、口径18、腹深10.8厘米,1987年山东临淄市淄河滩出土的节可忌豆通高22、口径17、腹深9.3厘米,1977年山西长子县牛家坡7号墓出土盖豆通高18.5、口径16.5、腹深10.3厘米^[12]。为什么在西周初年的戴家湾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铜豆?这似乎违反了青铜豆发展的基本规律,很难理解。或许关中西部独有的重食文化的土壤催生了它,使它变得极为独特。

虽然这4件青铜豆是否出土于戴家湾的同一个墓葬中不能确定,但青铜豆通常以偶数出现,参照茹家庄一号墓也出土4件青铜豆,所以戴家湾一个墓葬出土4件青铜豆也是很有可能的。迄今为止,在整个西周时期,只有戴家湾与茹家庄出土4件豆,这无论对豆的演变史还是探讨西周重食文化在关中西部的兴起,均具有重要意义。

7. 异形兵器

这件兵器的形态很奇怪,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称其为异形大刀^[13]。刀下部有短銎,其上设有方形钉孔。上锋较长,向刀背方向卷曲。下锋较短,斜直刺出。刀身有3处镂孔,形状均不规则。刀背有龙爪形钩。宝鸡竹园沟8号墓出土铜戟1件,亦有类似的钩形装饰(《宝鸡强国墓地》图版九五,5)。这件异形大刀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此刀造型奇特,尚无与之相同者。装饰风格繁琐夸张,当为仪仗用器。这是戴家湾墓地出土的最有特点的兵器。考虑到它比宝鸡竹园沟8号墓出土的铜戟更为复杂,后者可能是受戴家湾兵器的影响。

以上举了20多件器物的例子,可以看出戴家湾铜器无论在体量方面,精致程度方面,还是创新性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这样具有震撼力的青铜器,应该在中国古代青铜王国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一个难以解答的谜

戴家湾青铜器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何许人?关于戴家湾青铜器的族属问题,是一个最难谈的问题。对科学发掘的考古遗存谈族属问题,尚且有诸多困难,而像戴家湾这样被严重盗掘的墓地,既不知道墓葬形制,又不了解青铜器与墓葬的对应关系,也没有陶器和陶片,甚至不清楚这些青铜器是否一定出自这里,要谈戴家湾墓地的族属问题,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可以说迄今为止关于戴家湾墓地的族属问题的种种解释,都只是假设。以往的假设有高次若和刘明科先生的“周公家族”说,李学勤先生的“西虢”说,卢连成先生的“矢国”说。鉴于矢国很可能是姬姓,以上三说可以总括为“姬周家族”说。现在《任著》又提出一种新

的假说,主张戴家湾墓地是殷遗民墓地。确实在戴家湾铜器中有不少有族徽与日名的铜器,而且很多铜器与殷墟铜器相似或相同。

我在这里也提出一种假设:戴家湾青铜器的主人是一个同时受到殷商与姬周文化影响的土著部族。这是通过与强国青铜器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任著》在罗森等学者分析的基础上,专辟一小节来谈戴家湾青铜器与宝鸡强国青铜器的关系。窃以为这个比较很重要,因为二者同处宝鸡地区,文化背景相似,最具可比性^[14]。

据《任著》统计,戴家湾商周礼容器共145件(见其书附录四),其中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的只有8件,因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在商末周初,所以减去西周中晚期的8件,尚余137件:炊食器77件,计鼎35、甗5、鬲4、簋29、豆4;酒器56件,计尊6、卣11、觥3、方彝2、盃2、罍2、觚1、爵9、觶11、角2、禁2、斗5;水器4件,计盘2、盥2。

强国青铜器的数量是110件:炊食器72件,计鼎38、甗3、鬲5、簋25、豆1;酒器34件,计尊5、卣7、盃2、觚3、爵6、觶8、斗3;水器4件,计盘3、盥1。

《任著》已指出,两地所出青铜器数量与构成比较接近。诚然,由于戴家湾墓地是被盗掘的,遗失而未被统计的器物可能还有不少,所以我们所作的比较显然是很粗疏的,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收获。

1. 两群青铜器的相同之处

(1) 都有一些典型的商式、周式铜器。

扁足鼎:戈鼎(竹园沟13号墓),斂父丁鼎(戴家湾D:D08)

方鼎:子京方鼎(竹园沟13号墓),田告方鼎(戴家湾D:D01)

分裆鼎:父辛鼎(竹园沟13号墓),分裆鼎(戴家湾D:D05)

圆鼎:三角目纹鼎(纸坊头1号墓),兽面纹鼎(戴家湾D:D20)

鬲:矢伯鬲(纸坊头1号墓),斂父己鬲(戴家湾D:L1)

甗:兽面纹甗(纸坊头1号墓),戈甗(戴家湾D:Y4)

双耳簋:兽面纹簋(竹园沟13号墓),兽面纹簋(戴家湾D:G10)

带盖簋:带盖簋(竹园沟13号墓),带盖簋(戴家湾D:G14)

觶:斂父乙觶(纸坊头1号墓),斂父乙觶(戴家湾D:Z7)

盃:涡纹盃(纸坊头1号墓),兽面纹盃(戴家湾D:LE1)

盥:兽面纹盥(竹园沟13号墓),子父乙盥(戴家湾D:H1)

爵:覃父癸爵(竹园沟13号墓),父辛爵(戴家湾D:J2)

(2) 都有一些创新型铜器。

双耳方座簋:斂伯方座簋(纸坊头1号墓),凤鸟纹方座簋(戴家湾D:G01)

四耳簋:四耳簋(纸坊头1号墓),四耳簋(戴家湾D:G03)

剑:柳叶形剑(竹园沟多个墓葬出土),柳叶形剑(戴家湾D:JIAN1)

戟：戟（竹园沟21号墓），戟（戴家湾D：J13）

异形兵器：异形兵器（竹园沟8号墓），异形兵器（戴家湾D：S1）

三角援戈：竹园沟多个墓葬出土，戴家湾也出土多件

强国墓地虽然没出铜禁，但出土功能类似铜禁的漆盘，例如在竹园沟13号墓（甲组）“酒器集中放置在一长方形漆盘上”。竹园沟7号墓（甲组）也有漆盘，“盘上放有一组酒器，计卣二、尊二、觚二、觶一”。

（3）器物组合与构成。

最引人注目的是鼎、簋组合。戴家湾墓地有鼎35件、簋29件，相反酒器中的核心器物觚（1件）、爵（9件）、觶（11件）较少，同样强国墓地有鼎38件、簋25件，酒器中的核心器物觚（3件）、爵（6件）、觶（8件）较少，而且这些酒器来源庞杂，系拼凑起来的，并非基地的主流青铜器。戴家湾墓地这种重食的文化，显然不同于殷商的重酒文化。

在食器中，豆很别致。两个基地出土豆比较多。戴家湾墓地出土4件青铜豆，纸坊头、竹园沟墓地虽然未出青铜豆，但BZM4、BZM7、BZM17均出土漆豆一对，这种差别是由于级别的不同而不是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戴家湾墓地的等级要比竹园沟高。茹家庄一号墓也出土4件青铜豆，而且仅限于茹家庄一号墓，虽然时代要晚些。这一点不但显示出茹家庄青铜器受到戴家湾青铜器的深刻影响，也表明在宝鸡地区，唯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酒器中，有特色的是尊、卣，戴家湾墓地有尊6件、卣11件，强国墓地有尊5件、卣7件。戴家湾墓地有1件鼎尊，2件鼎卣，从铭文可知是1尊2卣（一大一小）的组合，竹园沟7号墓的伯各尊、卣也是如此组合。

2. 两群青铜器的不同之处

（1）戴家湾商周铜器群的上限比强国青铜器早，可能说明前者的主人在宝鸡生活的年代更早些。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多一些商式铜器，更多一些酒器，如觥、方彝、罍、角。

（2）戴家湾墓地出土11件尖刺乳钉纹盆式簋，这种纹饰的簋在强国墓地恰恰没有。鉴于簋在西周早期宝鸡地区墓葬青铜器组合中的特殊地位，我们以为这是区分戴家湾墓地与强国墓地族属的重要标志之一。

（3）戴家湾商周铜器中有几件姬周高级贵族的器物，而强国青铜器中只有姬周女性贵族的器物，相比之下，前者可能与姬周高级贵族的来往更多一些。

（4）戴家湾商周铜器中有一些重器，如49厘米高的方彝，而强国青铜器中没有，戴家湾的直棱纹鼎高44.5厘米，强国青铜器中最高的鼎是纸坊头鼎，通耳高40.2厘米。显然，戴家湾商周铜器的主人地位要比强国青铜器的主人高。

（5）戴家湾铜器中缺少乐器，这与年代有关。竹园沟7号墓（甲组）出土编钟，竹

园沟13号墓出土铙,而戴家湾铜器的年代大部分早于竹园沟7号墓与13号墓,那时钟尚未出现。戴家湾铜器中没有筒形卣,表明其受西方、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稍小。戴家湾铜器中无壶,这也与年代有关。在强国铜器中,壶是作为水器出现的,而壶作为水器的年代稍晚。戴家湾铜器中无盒。强国青铜器中无觥、方彝、斚、角等殷墟具有代表性的酒器,表明强国受商文化影响稍小。

在戴家湾青铜器群中,占主流地位的青铜器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哪些青铜器占主流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对戴家湾青铜器群性质的认识。虽然从表面来看,商式铜器数量很多,但是它并不代表戴家湾青铜器群的文化取向。在强国青铜器中,商式铜器同样数量很多,但是谁也没有将强国认作商的属国。设若强国青铜器上没有出现“强”字,对于它们的族属,我们会做何种判断?我们会以为它是殷遗民,因为其中有很多有日名、族徽的青铜器;我们会以为它是矢国的遗存,因为其中有矢国的器物——矢伯鬲。如果因为强国青铜器有铭文证明,所以认可它是一个与商文化不同的方国或部族,而戴家湾青铜器群没有铭文证明,就否认它是与商文化不同的方国或部族,这样做不免有持双重标准的嫌疑。

如果将戴家湾铜器、强国铜器与商周之际周原出土的铜器作比较,则周原有的,戴家湾和强国墓地基本上都有,而戴家湾和强国墓地有的,周原却没有,可以说唯有戴家湾的青铜器与强国墓地的青铜器最为接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戴家湾青铜器的主人与周人并不同族。戴家湾铜器、强国铜器的主人都是宝鸡地区的土著部落,差别在于前者受东方商文化影响较大,后者受西方与南方的羌戎、巴蜀文化影响较大。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对此我也并不很自信。

至于戴家湾国族消亡的时间,我们判断是在西周早期昭王以后不久。如前所述,戴家湾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殷墟四期到西周早期成康时期。昭王以后器骤然减少,而且昭王以后器没有特点,如西周中晚期的3件铜盘、1件铜盂。相比而言,强国一族即便到了西周中期,在茹家庄墓地,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有特点的强国青铜器。一种可能是戴家湾国族在昭王以后迅速衰落,勉强延续到西周中期;另一种可能是戴家湾国族在西周早期昭王以后不久就消亡了,所谓那几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是其他人入主戴家湾后的器物。

四、结 论

(1) 青铜禁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种,首先而且仅仅在戴家湾墓地出现;方座簋、四耳簋有可能首先在戴家湾墓地出现;西周最大的青铜豆首先而且仅仅在戴家湾墓地出现;商周最大的单体方彝——四出戟方彝仅仅在戴家湾墓地出现:这一切不仅显示了戴家湾青铜器的宏大,也说明在商周之际,戴家湾青铜器在继承殷商青铜器的风格的同时,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与能力。这是戴家湾青铜器对整个商周青铜器的一个重要贡献。

(2) 戴家湾青铜器的构成情况值得注意:一是饪食器的数量(77件)远远超过酒器的数量(56件);二是鼎簋数量大增,分别为35件和29件,成为青铜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物;三是作为殷墟酒器核心器物的觚很少,只有1件,爵的数量也不多(9件);四是酒器中尊与卣的地位上升,一尊配置一大一小两卣的新的组合形式率先在戴家湾墓地出现。这一切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商周之际,在陕西关中地区,通常墓葬中饪食器的数量往往不及酒器的数量,或者接近,但没有像戴家湾青铜器这样远远超出的。这说明我们以前提出的一个观点——重食文化首先兴起于宝鸡说是有充分根据的^[15]。这对于研究西周重食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是有价值的。

(3) 戴家湾青铜器群是商周之际宝鸡地区最大的青铜器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戴家湾青铜器鲜明地体现出了宝鸡地区器物特点。我们的研究过程告诉我们:要对宝鸡青铜器准确把脉,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进而评价陕西出土的青铜器,都离不开对戴家湾青铜器的认识。针对以往对商周之际宝鸡地区的青铜器评价不足的情况,应该重新予以考虑。

(4) 戴家湾青铜器群的年代主要在商末到西周早期。像这样年代比较集中的一批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不仅在宝鸡地区,就是在全国也不多见。以往学者在研究商周之际青铜器的时候,很少甚至不考虑戴家湾青铜器群,导致其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及利用。如果今后能充分发挥戴家湾青铜器群的效用,必将对商周之际青铜器的研究产生一定影响。

(5) 戴家湾的文化面貌非常复杂。这里既有典型的商式铜器,又有典型的周式铜器,还有混合型的铜器,还有受南方巴蜀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铜器。这正是难以判断戴家湾铜器族属的原因之一。我们的观点是无论戴家湾青铜器的主人姓“商”,姓“周”,还是姓“土”,作为宝鸡地区有影响的部族,在商周之际,它同时受到殷商文化与姬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又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在周王朝建立后,它又渐渐融入到周文化中,并为创造灿烂的西周文化作出了贡献。

(6) 据《任著》统计,戴家湾铜器中有族徽文字的铜器有鼎、鬲、鬲、觥、罍、尊、角、觶等共36件,占铜容器总数的25%左右,出现的族徽有28种。可以说戴家湾墓地是宝鸡地区出现族徽铜器最多的一个墓地,而宝鸡地区又是除了安阳殷墟之外,全国出土族徽铜器最多的一个地区。在商代与西周早期,一个地区出现的族徽铜器愈多,说明这个地区部族的流动性愈大,文化的交流亦愈频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戴家湾是文化荟萃之地。反过来讲,正是这种部族(国族)间的交流,促进了戴家湾文化的繁荣。

张懋镕

2009年7月初稿

2011年10月27日改定

注 释

- [1] 张懋镕:《西周方座簋研究》,《考古》1999年第12期;《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88~97页。
- [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2、43页。
- [3] 李海荣:《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52页。
- [4] 本文所引资料,凡是见于《任著》者,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26页。
-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320~322页。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460页。
- [8] 李娟利:《商周方彝的整理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 [9] 张懋镕:《上海博物馆藏金读记》,《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66、67页。
- [10] 张懋镕:《再论西周方座簋》,《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10页;《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98~111页。
- [11] 张懋镕:《三论西周方座簋》,《苏州文博》2011年第1期。
- [12] 张翀:《商周时期青铜豆综合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13] 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图九七。
- [14] 张懋镕:《试论宝鸡强国青铜器的特点》,《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42~150页。
- [15]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152页。

(原载《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